

# 数字创意产业对于“一带一路”跨区域嵌入的耦合意义 ——基于区域个体异质性的视角

陈能军<sup>1</sup>, 李凤亮<sup>2</sup>

(1. 上海交通大学 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0030; 2. 深圳大学 文化产业研究院, 广东 深圳 518060)

**摘要:**“一带一路”作为综合性的区域发展构想,就其本质内涵来说,就是倡导具有一定共性特征的地区、国家形成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发展的共同体。而在一定共性特征之上,本身具有文化、体制、技术异质性的地区或者国家,如何达成这种共同体,最先要解决的就是文化包容和发展信任。数字创意产业兼具文化、产业、技术三重属性,更是有利于突破区域异质体之间的文化包容、经济融合和发展互信等基本问题的优先产业,既能突破区域异质性的负向阻力,又能激活区域异质性对于区域共同体发展的正向动能。重构区域价值链,完善区域发展分工是数字创意产业跨区域发展的基础;强化区域个体之间的嵌入式重复博弈,是数字创意产业跨区域发展的必然手段。以数字创意产业为“伟大工程”的突破口,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将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的双重价值融合到区域共同体发展之中,实现区域发展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行路径。“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需要:一是重构区域价值链,完善区域发展分工;二是强化区域个体之间的嵌入式重复博弈;三是加大金融创新,支持数字创意产业发展。

**关键词:**数字创意产业;一带一路;异质性;文化包容

**中图分类号:**F4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20)04-0086-10

## The Coupling Significance of the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s Cross Region Embedding of "One Belt, One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al Individual Heterogeneity

CHEN Nengjun<sup>1</sup>, LI Fengliang<sup>2</sup>

(1. Antai College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30;

2. Institute of Cultural Industry,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gzhen, Guangdong 518060, China)

**Abstract:** As a comprehensive regional development concept,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 terms of its essential connotation, advocates that regions and countries with certain common characteristics should form a community of economic, cult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certain common characteristics, how to achieve such a community in a region or a country with cultural, institu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heterogeneity, the first issue to be addressed is cultural tolerance and devel-

收稿日期:2019-11-10

基金项目:201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上海数字创意产业贸易潜力、技术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编号:2019BJB013);中宣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课题“全球竞合背景下我国数字创意产业的战略与路径”;2019年深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般项目“人工智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研究及深圳路径探索”(编号:SZ2019B010)

作者简介:陈能军(1981-),男,湖南衡阳人,经济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文化创意经济、产业经济。

李凤亮(1971-),男,江苏盐城人,文学博士,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创意产业、城市文化研究。

opment trust.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ies have the attributes of culture, industry and technology. It is also a priority industry that is conducive to breaking through the basic issues of cultural tolerance,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mutual trust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We should not only break through the negative resistance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but also activate the positive kinetic energy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mmunities. Reconstructing the regional value chain and perfect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re the foundation of cross-region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 Strengthening the embedded repeated game between regional individuals is an inevitable means for the cross-regional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 Taking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 of the “great project” is a feasible way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itiative, integrate the dual values of Chinese culture and Chinese economy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communities, and realize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happiness. Finally, three suggestion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ies in the background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are proposed: restructuring regional value chains and improving the division of labor in regional areas, strengthening the repetitive game among regional individuals, and increas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to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ies.

**Key words:** digital creative industries; One Belt and One Road; heterogeneity; cultural tolerance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不断逾越、拓展地域空间障碍的奋斗史,从分散弱小的部族、村落发展到集中、强大的地区乃至国家联盟。这个进程,既是人类自身的进化史,也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sup>①</sup>区域之间的融合是贯穿始终的一条发展路线。伴随着当代全球化思潮的兴起,人类发展需要突破的“区域”越来越宏大,地区与地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愈发紧密和不可分割,各国人民的全球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正在成为全新的全球化发展动力引擎,将“一带一路”区域内地区、国家共同发展视为基石,将相关地区和国家间的务实合作和平等互利视为行动原则。<sup>②</sup>有如全球化趋势,“一带一路”构想的实现进程也必然会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sup>③</sup>如何在集中与分散、单一与多样、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合理嵌入发展行为与要素,是“一带一路”倡议得以持续推进的基本前提。

数字创意产业,一般认为是以创意和内容为核心,依托数字技术进行创作、生产、传播和服务,作用于人的各种感官,广泛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新型业态。<sup>④</sup>作为一种新型的融合产业形态,在国家相关产业发展规划中已经成为与新兴技术、生物、高端制造和绿色低碳产业并列的五大新兴支柱之一。<sup>⑤</sup>数字创意产业本身具有的文化+技术+产业的多重属性,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一体化融合提供最为契合的发展内涵。

## 一、文化包容和产业融合:“一带一路”和数字创意产业的耦合价值

### (一) “一带一路”的共同体发展目标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巴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首次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同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将“一带一路”定为专有名词,特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新时期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旗帜和主要载体,<sup>⑥</sup>也是新时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于国际分工合作、互联互通的全球化发展模式创新。“一带一路”倡议以“丝绸之路”文化符号起源地——中国为核心纽带,致力于将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成

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②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2017年1月25日。

为政治互信、文化包容、经济融合的三大目标共同体。

政治互信,就是发展互信。包含一切政治行为的人类逻辑,在本质上都是发展的逻辑,包括人类基本生存条件的发展,人类自身改造和对社会改造的自由<sup>①</sup>及能力的发展。在“类”<sup>②</sup>的发展藩篱之下,“群”的发展、“个体”的发展就不再是抽象的、一致的发展,而是不平衡的、不同步的、有差异的个体之间的竞争性与合作性相统一的发展。在这样的发展含义下,不管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竞争或者合作,个体之间的双边互信必然成为基调。“一带一路”倡议的目标之一就是促使沿线国家(地区)在尽可能涉及的文化、经贸、安全、环境与健康等合作领域达成一定的发展互信状态。

文化包容,展示的是文化自信。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上,坚持开放、兼容、多样化和对话的原则,是文化包容的本质。无论有多少种界定,文化都是一种人化,即沉淀在物质器具中的人类意识、思维、观念、精神的提炼,以及这种意识、思维、观念、精神本身在人们之中的传递、承袭与创新。文化的根植性不仅说明了文化的产生之源,更是说明了文化对于整个社会领域持续发展的决定性意义。“一带一路”倡议下,沿线各国家(或地区)在文化上是“和而不同”的状态,在坚持和包容传统性差异的基础上,采取开放和对话的文化发展策略,互学互鉴,取长补短、共同提高。<sup>③</sup>

经济融合,是区域共同体发展的最基本的主题。经济发展是各国人们的共同奋斗目标,各个国家和地区因为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不同,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相关产业价值链上的位置也不相同。融合各国的要素优势,合理分工将是各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把各自独立的经济发展由外部经济转化为内部经济,才能大大降低交易成本;只有通过产业融合,才能使各国各地区在相同产业或相似产业的发展中实现聚集与联合,避免过度竞争造成资源浪费的同时促成共同发展。“一带一路”下的经济发展,我们更加强调的是合作共赢、融合发展,强调沿线各国在诸多产业领域的合作与分工。“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业态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

## (二) 数字创意产业内在属性与“一带一路”的耦合价值

充分利用数字创意产业的战略性作用,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实现的突破口。数字创意产业是一个兼具文化创意内容、技术呈现手段和经济融合产业三大属性为一体的新型载体,数字创意产业的这三大属性能够完美耦合“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包容、产业融合发展愿景,继而更好地促成沿线国家(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达到高度的、全面的、可持续的发展互信。这种发展互信既是个体之间文化包容和经济融合的前提内容,也是其最终发展的结果形式。

数字创意产业的文化创意内容属性,无疑是其发展的基础。这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文化包容方面必须完成的、对于沿线国家之间的双向文化嵌入的基本内容。使各国的文化在其本质内容上得到相互的了解、尊重、认同、学习、借鉴,只有在对各自文化在本质内容上有了一定的双向嵌入,才能做到文化认同,才能得到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在文化性格上的基本认同与接纳,这就是信任的基础。而这个基础,我们称之为“文化内容”的东西,其相互认同与接纳的长期积淀形成的将会是制度安排,而制度就是固化和确定性,亦是外部问题的内部化,外部的经济走向内部的经济。制度形态不论是正式制度安排或者非正式制度安排,实际上恰恰又与“文化内容”存在着或息息相关、或合二为一的客观关系。

数字创意产业的技术呈现属性,不仅仅是文化内容的传播、交流与相互吸引,更是引发文化内容传递途径和形式的技术变革之源。技术形态是改变经济行为模式的最强大动力,以文化创意的精神意识层面内容为基础,以数字化作为技术手段,从文化创意的研发、生产、发行、消费到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完整流程,数字化都是一剂强力,它改变着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使数字创意几无边界。即便跳出数字创意产业,延伸到更为宏观的整个社会经济产业发展,技术变量也总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最大驱动

① 阿马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2002年)中把实质的自由作为新式发展观的基石。

② 这里的“类”是从马克思关于人的类本质理论而引发,强调的是人类异于其他动物的本质共性。“类”之下的“群”和“个体”是一定范围的集合和单个体,在国际关系范畴内就是国家(或地区)的集合和国家(或地区)的单个体。

③ 习近平在2014年6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力。数字创意产业中的技术驱动,一是其诸多边际融合产业都能够直接共享互通的,二是可以通过跨区域传播产生技术溢出效应的,因而数字创意产业的技术呈现属性是推动整个经济产业技术升级甚或一定区域共同体技术发展的同向驱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技术发展本身的价值,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中实现经济融合的利益共同体的基本前提。

数字创意产业的经济产业属性,是其简单粗暴而又必然的目的指向。没有产业化的数字技术也好,文化创意也好,都不会引导现代社会人类福利的(直接的)创造行为与结果分配。不管我们多么不懈地强调文化的高大、云端和植根性,文化的根本还是“人化”(即人的本质对象化),“广义的文化本质即自然人化,按照马克思理论,自然人化即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sup>[5]</sup>因此文化必须是为人类的福祉进步服务的,包括前面谈到的文化认同。也就是说产业化发展的文化形态一定是文化与文化之间相互认同、包容、融合的基本目标。“一带一路”倡议的共同体发展本质,不谈共同体内各成员国家的共同福祉的促进,不谈各成员国家人民经济物质水平的提升,不谈各成员国家共同抵御经济社会发展危机、自然环境危机能力的提升,都将是一纸空谈。

## 二、区域个体异质性:共同体发展的障碍抑或动力

### (一) 异质性假设在经济学中的分析逻辑链

“异质性(Heterogeneity)是与同质性相对的,其本质内涵就是具有参照意义的个体之间的差异性、特征性和多样性”。<sup>[6]</sup>本文认为,异质性假设在经济学领域的发展应该存在着产品异质性——企业异质性——区域异质性这样的微观到宏观的递进分析逻辑链。

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产品以及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都被认为是同质的,同质性假设是完全竞争市场理论的特征和前提,是对现实环境中复杂情况的简单化处理。而不完全竞争市场认为产品及其生产要素之间存在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异质性假设才是更具说服力和现实意义的,由此说明了异质性的凸显实际上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具体化扬弃;不同于市场结构理论的产品与要素视角的异质性假设,新新贸易理论<sup>①</sup>主张把异质性上升到企业异质性的高度,企业异质性是一种综合性的、总归为企业生产率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基于企业的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出发,使二者的投入比率适用企业内部生产率的最优化发展,这是从企业层面对于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异质性的综合归化;随着对异质性的持续关注,“迄今的研究实际上隐约地触及一个因素,这便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的异质性(Heterogeneity)。迄今研究已经触及的异质性包括收入水平、制度、贸易、FDI与国际分工等异质性,实际上除了此类异质性之外,还有许多别的异质性,包括文化、大众偏好等异质性”。<sup>[7]</sup>这类异质性是更为宏观层面的区域经济体之间的异质性,也是各种微观层面和中观层面异质性持续累加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区域异质性,是更难以突破的、对共同体发展的阻碍或者激励效果尤为显著的一种异质性。我们可以从社会经济学的嵌入理论以及全球分工思想的 GVC(Global Value Chains, 全球价值链)等理论中找到这种宏观意义上的异质性理论的身影。

表1 异质性的递进分析逻辑

	产品异质性	企业异质性	区域异质性
基础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 市场结构理论	新新贸易理论	嵌入理论 GVC理论 竞争优势理论
分析层次	微观层面	中观层面	宏观层面
表现形式	产品(质量、品类、价值)及其 生产要素诸如劳动、资本、土地等	企业人力资源及非人力资本 (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	区域个体的文化、体制、科技、 自然资源等总体性差异、特征
特征	要素片段	企业综合归总	区域持续累加、稳定

### (二) 区域个体的异质性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影响

在论述区域异质性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作用影响之前,需要厘清异质性、共同体、同质性几个概

① 新新贸易理论是以 Melitz(2003)等学者提出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和 Antras(2003)、Helpman(2004)等人提出的企业内生边界模型为基础,更多地从企业层面解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现象的贸易理论。

念的关联。简而言之,共同体发展不等于同质性发展,促进共同体发展需要突破一些异质性障碍。具有区域异质性的异质体之间,要实现相互融合走向共同体的发展蓝图,既要突破区域异质性的负向阻力,也要激活区域异质性对于区域共同体发展的正向动能。因而对区域异质性的进一步认识和探讨就是我们需要完成的基础工作。基于“一带一路”倡议构想的特设背景,以及数字技术发展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深刻影响,本文着重讨论文化、体制、技术、资源四个方面的区域异质性。

### 1. 文化异质性

区域个体的文化异质性,尤其是“一带一路”下的文化异质性,借鉴 Kogut 和 Singh (1988)、Hofstede (2001) 关于文化异质性的定义,可以解释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在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等精神因素上的差异化和多元化程度。相对于制度体系来说,文化的异质性更强调的是非正式的、不成文的、心理上的、缄默性的精神因素差异。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的文化异质性形成和发展是多方面因素合力促成的,最为主要的有地理环境差异、民族构成差异、宗教发展差异、历史选择差异、传统习俗差异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中的宗教发展、传统习俗与文化异质性存在互为因果的双向关系,而传统习俗与地理环境、民族构成息息相关,体现的是地理限定性和族群遗传性(指文化遗传性而非生物遗传性)。

区域个体的文化异质性的存在对于“一带一路”的共同体发展具有抑制作用,一方面文化异质性不利于各国建立起双边发展信任,差异的存在必然引致相互了解、相互适应乃至至于试探性接触等一系列的信息成本、信任成本或者其他交易成本,这意味着双边信任关系建立的难度及成本会随着文化异质性程度的增加而增加;另一方面,文化异质性的存在不利于包括劳动者、资金、技术乃至生产企业在内的经济要素和经济产业的交流融合,文化差异俨然已经成为区域个体对外经贸交流的障碍,“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观念是重要的决定经济交流的因素”。<sup>[9]</sup>于是我们便可以看到“七七定律”<sup>[9][10]</sup>的经济文化现象:跨国并购中 70% 的并购没有实现预期的商业价值,其中 70% 的失败在于并购后的文化整合,文化差异越大,失败的可能性越大。

### 2. 体制异质性

区域个体的体制异质性,是指区域个体在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管理机构及其运行制度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它是由管理机构的异质性、管理制度及其运行的异质性两部分构成。从职能上讲,各国(地区)管理机构的构成在意识形态之外的差异并不明显。从动态性和根本性来讲,管理制度的运行远比组织机构的构成更具差异性、动态性和开拓创新的空间,这种认识是对结构—功能主义范式的发展和超越。“制度提供了一个国家的法律、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安排,决定了商业活动中的交易和协调成本以及创新活动的程度”。<sup>[10]</sup>关于体制异质性的产生原因,一种比较洪亮且易于接受的制度主义声音来自政治科斯定理:“当各方可以毫不费力地谈判时,他们会努力内部化各种可能的外部性,……剩余如何分配不会影响制度的选择,社会基本需求的差异才是导致国家间制度差异的原因”。<sup>[11]</sup>

异质性的体制供给对“一带一路”跨区域经济嵌入具有抑制作用,这种抑制作用是通过“一带一路”协作主体的投资动机和协调成本传导到嵌入进程的。投资动机包含追逐利润和规避风险两类情形,“体制”语境下的利润主要有各国(地区)的资源政策红利、税收政策红利、产权保护红利、法制程度红利等;“体制”语境下的风险主要有各国(地区)的社会稳定性风险、政府效率性风险(包括腐败控制、政府支出、社会监督等)、经济自由度风险(包括关税壁垒、汇率制度、版权制度等)。体制异质性导致“一带一路”跨区域经济嵌入的协调成本来源于生产和流通的多个环节,比如环境保护和污染控制方面的制度协调成本、政策壁垒成本、合同实施成本、资金给付制度协调成本等等都是不可回避的。

### 3. 技术异质性

区域个体的技术异质性,应该从静态的技术异质性和动态的技术异质性两个方面来阐述。静态技术异质性,即是区域个体的技术发展水平在地理空间上呈现的非均衡性和差异性,可以通过人力资本存量、技术研发投入量、专利和知识产权数量等存量指标刻画出来。动态技术异质性,是指区域个体技术水平对于区域以及区域间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发展的交互作用的差异化体现。这里的技术异质性

已经将技术变量纳入突破地理空间和融合发展领域的理念上来,所以动态技术异质性是比较难以刻画的,但是这种技术异质性对于“一带一路”倡议和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具有更加显著的现实意义,因为它是已经涉及区域一体化、产业融合和嵌入性问题等层面的动态考察。引致区域个体技术异质性的因素同样是多方面、多层次和不断更迭的,通常包括人力资本积累、教育发展水平、研发资金投入、FDI 技术溢出、技术引进消化、创新文化氛围、产权制度安排、贸易及产业政策、金融深化进度、市场竞争与自由程度等因素,以及上述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结果。

区域个体技术异质性的存在,对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来讲,更为重要的是意味着合作与分工的动力所在:一方面,这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比较优势发展原则决定的。由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发展而来,大卫·李嘉图最终确立的比较优势理论,就是基于生产技术差异导致的成本差异,因而鼓励国际贸易采取比较优势的贸易分工策略。并且此后陆续发展的以技术创新为最重要出发点的动态比较优势的相关理论逻辑,比如转换比较优势理论、逆比较优势战略、相对性逆优势战略等等,其基础和核心都离不开区域个体的技术异质性。另一方面,区域共同体的合作与分工在经济上就是区域价值链的构建,工艺技术资产是构建区域价值链控制权的有效途径,异质性的技术禀赋对应着、匹配着异质性的价值链治理权限或者价值链租金分配所得。

#### 4. 资源异质性

区域个体的资源异质性,特指区域个体在人口构成、基础设施、地理环境、自然物产方面的差异性。这里的“资源异质性”跟“异质性资源”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对资源状况的差异性描述,强调差异性和多样化,更多用于经济学范畴;后者是对企业竞争优势的稀缺性发掘,强调有价值的稀缺性和不可模仿性,更多用于管理学范畴。资源异质性是区域个体异质性的物质起点,是区域个体的差异化的硬件构成,主要包括如下区域要素的差异化体现:人口数量与结构、土地面积、地形地貌、气候环境、自然矿产与资源以及包括交通、能源、通信、卫生、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各类生产和生活基础设施。区域个体的资源异质性直接影响区域个体之间的合作方式、合作方向、合作深度和合作效果,“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的合作重点之一——“设施联通”,就是针对合作国家之间的基础设置建设状况开展的。仅就信息基础设施而言,基础设施的大力发展“对于经济贸易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对于增强国力具有显著意义,对于互联网区域治理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sup>[12](164)</sup>

### 三、发展数字创意产业:突破区域个体异质性

“以数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文化创意与创新设计等产业加快发展,促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相关产业相互渗透。到2020年,形成文化引领、技术先进、链条完整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格局,相关行业产值规模达到8万亿元”。<sup>①</sup>这是国务院《“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关于发展数字创意产业的总体性阐述,是中国政府在全球科技变革与中国产业结构调整交汇这个时间节点上,首次将数字创意产业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范围之中。发展数字创意产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重要性推力的衍生之源在哪里呢?除了从数字化到数字经济、再到数字创意产业的科技牵引逻辑与路径,贯穿本文研究的一个基本方向,即“一带一路”的共同体发展路径,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牵引源头。

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与突破区域异质性的负向阻力、激活区域异质性的正向动能,实际上是一个同步共轨、耦合联动的复杂过程。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基于区域异质性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关系,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现和深化推进,也是一个同步共轨、耦合联动的复杂过程。这两个“同步共轨、耦合联动”过程,具体可以通过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形成四个方面的效能传导机制而得以实现。

<sup>①</su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6年12月。

### (一) 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促进文化包容

数字创意产业的数字化形式是区域文化内容深度融合和传播的最佳工具。随着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蓬勃发展,以互联网为载体的数字化信息处理技术已经成为跨区域文化交流和融合的最主要手段。根据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课题组的调查研究发现:“在七国<sup>①</sup>青年接触中国文化的渠道方面,互联网占比为53.60%,社交网站和搜索引擎成为青年群体了解中国文化的主要方式。……社会文化信息的传播已不再完全依赖传统媒介渠道,网络传播与人际传播打破了原有的传播格局,实现了一定范围的自由流动。”<sup>②</sup>

文化的传播与融合被限于地理空间,又将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多元文化之间虽存在差异,但却不必导致激烈的文化冲突。相反,不同文化之间的兼容并包、相互尊重、求同存异,才是人类文化的共同繁荣之道。”<sup>[13]</sup> 数字创意产业的核心力量之一是数字化的力量,数字化的信息手段能够深化文化融合、强化文化包容、加速文化传播、扩宽文化认同。从信息与文化互为转化的角度,文化及文化的传播本质上也是一种沉淀化、凝练化、抽象化的信息及信息传播,因而无论是对于加快单个族群文化事业的发展,还是推进多个文化体系之间的相互融合和认同发展(当然也涵盖文化传播),数字化都是必须顺应而且大有可为的技术浪潮。发展数字文化创意产业符合这一趋势,也正是对这一趋势的具体化拓展。

数字创意产业在跨区域之间的融合发展,尤其是对“一带一路”沿线区域个体之间的文化包容起到的促进作用,本质上就是技术对于不同内容的传播、认同、包容的促进作用,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推进跨文化的精神包容。数字化技术手段使文化内容得到更为完美的传播效果,使文化及“跨文化”的受用者得到更为理想化的审美体验。数字化技术打破了物理空间的障碍,改变了人们的文化消费形态,文化的内容与形式在远远超出地域国界的市场上,在跨越文化国界的道路上被创造、传播和认同,为跨区域的文化包容节省了大量的时间成本、沟通成本、信息成本。

### (二) 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促进发展互信

数字创意产业的发展与共同体多边信任机制的构建,在作用形式上有着同一性,发展数字创意产业的制度措施在客观上也能同步促使发展互信的建立。关于这个命题,我们将就正式制度安排、非正式制度安排和发展资金等方面的内容,探讨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和构建发展互信的同步性。

#### 1. 正式制度安排在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和构建发展互信中的同步

在制度经济学的共识中,制度的本质就是约束,<sup>③</sup>确定性的约束。只有确定性约束的存在,才能最大可能地避免因知识和信息的非对称造成风险或者损失。经济人假设加剧了这一行为理性的蔓延,尤其在外部区域、外部组织和外部文化的博弈中。因而制度范畴下的法律、制度、规范、章程、公约等成文性正式制度体系的构建成为现代经济的基础,也自然成为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基础(涉及跨区域便应升级为共同遵守的多边制度体系,如“一带一路”情境下的多边体系)。

信任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马克斯·韦伯的经典权威理论,<sup>④</sup>也可以分为两类:一是传统的基于个人魅力、个人信息、个人情感的人格信任机制,二是基于契约、合同、规则、法律等正式制度体系的契约信任机制。不难发现,传统的非制度信任机制具有极为浓重的地域根植性,因传统经济活动的地理限制导致的。在现代社会的跨区域行为越来越频繁和深入的条件下,尤其是我们特别关注的“一带一路”背景

① 课题组综合考虑沿线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信仰等因素,分别选取了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印度、土耳其、以色列、埃及等7个国家展开调研。

② 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课题组《“一带一路”沿线七国青年对中国文化认知的调查》,《光明日报》,2017年8月24日。

③ 比如道格拉斯·诺思就曾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4年)中论述“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

④ 马克斯·韦伯将政治权威分为传统型、魅力型和法理型三类权威。而本文对信任的划分则减去了传统型,保留人格魅力型和法理契约型两种分类。

下,制度结构型信任机制以其稳定透明和可预测性强已经对传统的人格信任机制发起了冲击。比如在我们的财务管理实践中的应收款制度、保障金制度、担保制度等都为信任的建立提供了稳定的、可预期的保障,而这些几乎不可能仅仅基于人格信任,在区域发展互信中,这也正是“一带一路”倡议资金池形成的根本原因。

## 2. 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和构建发展互信中的同步

非正式制度安排相对于正式制度安排,其对于人类社会经济行为的影响更加具有潜在性、缄默性和无意识性。新地理经济学者们在“社会嵌入理论”中,将“文化嵌入”(笔者认为还应该包含人格关系嵌入,但不含法律关系嵌入)看作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这里的“文化嵌入”即是非正式制度的嵌入,包括观念、宗教信仰、民俗、传统意识、道德评价等非正式制度约束,以及人们之间的基于血缘、学缘、地缘、业缘的人格关系约束。

非正式制度安排对于数字创意产业在不同区域间的融合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充分的、对话性的、认同性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的长期重复嵌入,也是建立多边信任机制的必要途径,正如制度型信任是人格型信任的某种积累,信任应源于了解、认知、认同诸如此类潜在性、缄默性、无意识性的文化包容。

## 3. 资金规模的壮大在发展数字创意产业和构建发展互信中的同步

资金规模的壮大无疑是数字创意产业发展的最大助力。数字创意产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其自身具有的发展历史短、资金积累少、企业信用低、资产结构轻量化等特点,都对其发展融资提出了巨大挑战。创新融资模式,加速数字创意产业与金融、科技等产业的深度融合能一定程度解决产业价值链之间的融资问题。而加速区域之间的相同产业链内部的融合发展,依托“一带一路”倡议资金池,包括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以及其他地方“一带一路”资金池,将是数字创意产业走向跨区域融合发展的强劲动力。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资金规模就是实力保障,而信任则部分地、天然地来自对实力的认同,所以强大的资金保障在经济活动的信任机制的构建中至关重要。“一带一路”倡议资金池及其金融制度体系的存在,为我们的跨区域对外经济投资和产业融合提供了坚实的信用基础。

### (三) 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促进区域技术进步

#### 1. 数字创意产业的技术创新是整体科技创新的主要部分

数字创意产业领域的装备与技术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发展。首先是在创作技术水平与装备方面的创新,<sup>①</sup>包括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全息成像、裸眼三维图形显示(裸眼3D)、交互娱乐引擎开发、文化资源数字化处理、智能语音与视觉识别、互动影视等空间情感感知性和数字信息转化性基础技术的创新发展;其次就是在传播服务技术水平与装备方面的创新,包括超感影院、混合现实娱乐、广播影视融合媒体制播、新型移动媒介传输、互联网数字传播等配套装备和平台等媒介传播装备及技术的创新与发展。这两个方面装备与技术的发展与创新,必然促使其他领域其他方面的技术发展与创新,一来是因为数字创意产业的外延形式具有较大的宽泛性,数字创意产业能够广泛融合到影视、文艺、会展、教育、科研、交通、玩具、家具、家居用品、包装品、文具、食品、图书、鞋帽、服装、酒店、主题游乐等多种泛文化、泛娱乐业态,二来是因为技术创新本身的交融性。现代科技情境下,绝大多数重大技术的突破,都是由多领域基础性技术的融合与协同创新而完成的,一个产业领域的技术进步促进多个产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已是常态。

#### 2. 技术进步在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上的治理权日益凸显

数字创意产业中,创意是内容和核心,技术是手段和衍生,他们在数字创意产业整个价值链上的作用都非常显著。但无论是更广泛的文化与科技层面,还是数字技术与创意产业层面,“当现代科技强制

<sup>①</sup> 笔者对于数字创意产业的装备与技术的涵盖和分类,主要来自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的第六部分内容“促进数字创意产业蓬勃发展,创造引领新消费”。



助推文化符号成为被消费的对象时,文化与科技之间的失衡也随之浮现”,<sup>[14]</sup>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文化创意产业价值链的租金分配或者说价值链治理权问题上,技术与创意的相互拉锯和争论早已开始喋喋不休。2009年谷歌数字图书馆侵权案发生后,美国社会各界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美国作家协会主席 Roxana Robinson 认为,‘法院的判决将使创意产业的财富向技术领域大量转移’,‘法院正在让技术产业不公正地站在创作者的背上攫取利益——这已经成为一场渐渐成型的版权政策斗争的原则’”,<sup>[15]</sup>一些人则意见相反,如 The Washington Post 认为‘该案是合理使用的巨大进步’,Samuelson 和 Pamela 认为‘谷歌诉讼胜利对作者非常有利’,Palfrey 和 John 认为‘谷歌图书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sup>[15]</sup>

关于创意与技术数字创意产业价值链中的治理权问题,本文认为,在尊重创意的核心性和决定性的同时,技术力量对于创意及其衍生价值的放大效应越来越具有关键的意义。数字创意产业区域价值链的构建中,来自技术的价值链内生租金所占整个价值链租金的比重越来越大,技术进步对于价值链升级关键的附加值提升更加具有决定意义。这种指向的结果是,区域价值链片段分工的参与者们,包括微观层面的厂商和宏观层面的国家与地区,都将视抢占技术高点为目标,以提升自己在区域价值链中的治理权限,从而实现更大限度推进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那么区域技术进步就必然成为演化目标,同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实现沿线国家(或地区)整体性技术进步的基本路径。

#### (四) 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促进区域分工

文化和产业资源上的融合性、交互性、互补性是共同体发展的基本逻辑,将突破或者激活区域个体之间文化内容的异质性和经济资源的异质性,统一到数字创意产业的区域融合上来,就意味着促进区域分工的发展。就其基本功能来讲,数字创意产业就是将文化内容或者说是创意 IP 进行数字化的加工,直接生成或者衍生产出为创意产品和创意服务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从创意或者 IP 的输入,到产品和服务的输出都存在文化内容和资源附加的区域差异,而这些差异在共同体发展趋势的推动之下必须要实现互补。那么各区域个体,同样包括微观层面的厂商和宏观层面的国家或地区,他们的 IP 创造也好,数字化加工也好,资源附加生成产品也好,就必然根据各自文化内容和资源禀赋的不同而开展分工合作,才能达到资源配置与价值分配的最优化组合。

此外,数字创意产业以技术创新为引导,是促进文化产业向新兴业态的跨区域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新兴文化业态作为文化产业未来增长的关键领域,相对于传统文化业态在价值传递、审美增值、资源活化、原创培育、经济增长等方面的作用更加凸显,可以大幅度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sup>[16]</sup>我们认为,区域分工无疑是新兴文化业态区域融合发展的主要指向。

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促进区域分工是基于资源异质性来讲的,当然我们如果可以广义地将文化内容上的异质性,也就是创意或 IP 输入端的异质性也纳入资源异质性之中来,这就使得“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促进区域分工”的论证显得更加自然、严谨和具有说服力。

### 四、“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建议

本文首先开展了“一带一路”和数字创意产业在共同体发展目标和产业属性的耦合性价值的论述;然后就区域个体异质性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的逻辑路径分析,以及对于几类主要区域个体异质性的分类探讨;接着对发展数字创意产业与突破(或激活)区域异质性的正、负向效能的“四向效能传导”机制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拟就“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的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提出三点建议:

(一) 重构区域价值链,完善区域发展分工。“一带一路”共同体发展背景下的数字创意产业,要打破传统的全球价值链结构,尤其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体的对于区域价值链主导权的需求应该得到满足,中国的数字创意产业企业应该从过往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的局面和位置,转向以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为竞争优势的区域价值链顶端,抢夺治理权,占据区域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片段。要以中国为数字创意产业的制造、流通和消费的枢纽中心,推进贸易便利化,提高双边贸易效率,加快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合作<sup>[17]</sup>。

(二) 强化区域个体之间的嵌入式重复博弈。中国的数字创意产业要勇于“走出去”和“引进来”,要充分强化与其他区域个体之间的嵌入式博弈,并且持续稳定地重复下去,逐渐固化文化认同和发展互信,达到使区域个体之间的异质性障碍逐步减少、异质性活力逐步张扬的目的和状态。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和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之间的每一次互动,都是一笔双边信用记录,长时段的重复博弈就形成了中国数字创意产业与沿线国家和地区之间在文化与经济融合方面的信用档案,也是中国数字创意产业逐步走向世界的轨迹刻画。

(三) 加大金融创新,支持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数字创意产业的高技术性必然引领其高创新性,高创新性则依赖于更大的资金投入,而融资难又一直是制约其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金融业作为引导资源配置、调节经济运行、服务社会发展的主导行业,应加大各类金融创新支持数字创意产业发展。以亚投行为例,亚投行聚焦整个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其运营致力于促进亚洲经济发展、缩小国家间经济发展鸿沟。从亚投行未来三个重点领域来看,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跨境互联互通、动员更多私人资本参与都可以与“一带一路”数字创意产业进行关联和获得金融支持。

总之,以数字创意产业为“伟大工程”的突破口,是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将中国文化和中国经济的双重价值融合到区域共同体发展之中,实现区域发展利益共同体和人类幸福命运共同体的可行路径。

#### 参考文献:

- [1] 金玲. “一带一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 [J]. 国际问题研究, 2015(1): 88-99.
- [2] 俞可平. 全球化的二律背反 [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1998(4): 3-5.
- [3] 范恒山. 加快发展数字创意产业 培育壮大新动能 [J]. 宏观经济管理, 2017(10): 9-11.
- [4] 刘卫东. “一带一路”:引领包容性全球化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7(4): 331-339.
- [5] 张建云. 自然人化:马克思主义文化本质观及其当代意义 [J]. 学术论坛, 2015(6): 128-133.
- [6] 陈能军. 发展数字产业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12-28(7).
- [7] 赵伟. 产业异质性与中国环境拐点:一个空间经济学分析框架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7(3): 32-41.
- [8] 黄新飞, 翟爱梅, 李腾. 双边贸易距离有多远?——一个文化异质性的思考 [J]. 国际贸易问题, 2013(9): 28-36.
- [9] 吴晓云. 全球营销管理 [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8.
- [10] 潘镇, 殷华方, 鲁明泓. 制度距离对于外资企业绩效的影响——一项基于生存分析的实证研究 [J]. 管理世界, 2008(7): 103-115.
- [11] 黄新飞, 舒元, 徐裕敏. 制度距离与跨国收入差距 [J]. 经济研究, 2013, 48(9): 4-16.
- [12]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 数字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机遇与挑战 [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7.
- [13] 李凤亮, 宇文曼倩. “一带一路”对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及对策 [J].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48-54+60.
- [14] 李凤亮, 宗祖盼. 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演进机理与历史语境 [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6, 30(4): 11-19.
- [15] 张军华. 美国版权法中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规则及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J]. 图书馆建设, 2017(4): 26-33.
- [16] 李凤亮, 宗祖盼.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文化业态创新战略 [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1): 133-141.
- [17] 王微微, 谭咏琳. 贸易便利化水平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的影响分析 [J]. 经济问题, 2019(9): 120-128.

(责任编辑:余小江)